

教化与礼仪学术

第5典

第6典

科学技术

第7典

宗教与民俗
中外文化交流
历史沿革
地域文化
民族文化
制度文化

第9典

第10典

第1典

第2典

第3典

第4典

中华文化
通志

第8典
【艺文】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典籍志



李致忠
周少川 撰
张木早

中华文化
通志

第 8 典
【艺文】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典籍志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萧 克

编	委	李学勤	宁 可	王 尧	刘泽华
		孙长江	庞 朴	陈美东	刘梦溪
		汤一介	姜义华	陈 昕	朱金元
		张国琦			

办公室主任 张国琦

办公室副主任 王科元

策 划 姜义华 张国琦

典籍志

作者简介

李致忠,1938年生。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现任国家图书馆业务处处长、研究馆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古籍版本研究分会主任委员。著有《古书版本学概论》、《历代刻书考述》、《宋版书叙录》等。发表论文150余篇。

周少川,1954年生。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副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秘书长。著有《古籍目录学》、《汉书选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点校)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张木早,1962年生。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同年到北京图书馆工作。著有《文献与文献收集》等。发表论文多篇。

总 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起伏跌宕；哺育着差不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灿烂辉煌。它坦诚似天，虚怀若谷，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面传播的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和以直，健以稳，文而质，博而精，大而弥德，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勿论东西，不分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己的载体和灵性，当然也就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练。准乎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质文化同等权利的人间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种优点，来推动自身发展；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优点，来保证自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园。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帷幕徐徐降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便是我们为此而向新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做出的奉献。

《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十典百志。

唐人杜佑著《通典》，罗列古今经邦致用的学问，分为八大门类，“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务求做到“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通典》的这一编纂方法，为我们所借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列。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按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大区域交往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排列。

宋人郑樵《通志·总序》有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志者，宪章之所系。”指的是，史书的编纂关系到发掘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纂者不能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而应在驰骋于遗文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所归”，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

本书以典、志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可以概括为“类”与“通”二字。

“类”者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典十志，各为大门类下的一个方面；每志中的“编”“章”“节”“目”，亦或各成其类。如此依事立类，层层分疏，既以求其纲目分明，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而入，由道以行，俾著者、读者都能于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骊得珠，自在悠游。

“通”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其始终，察其源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不由几及显，自微至著，就是说，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弄清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观念的演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了它内在本质，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物质的往往决定观念的，观念的又常左右物质的；而介乎二者之间的制度，固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临天下，使制之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次形态之间，也互相渗透，左右连手，使整个文化呈现出一派斑斓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硕果；境外许多不同种的文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爬梳剔理，还它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汇通”。

“通”者会通。“会”字，原义为器皿的盖子，引申为密合；现在所说的“体会”、“领会”、“会心”、“心领神会”等，皆由此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通，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悟，与中华民族心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这就是《中华文化通志》依以架构旨趣之所在。是耶非耶,知我罪我,恭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中华文化通志》由萧克将军创意于1990年。1991年先后两次在广泛范围内进行了论证。1992年组成编纂委员会。十典主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主持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1993年1月和1994年2月,全体作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都市,研究全书宗旨,商定典志体例,切磋学术心得,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编委会更多次就全书的内容与形式、质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协作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行了创造性构思和奋斗式劳作。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了大量的日常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本书出版任务,并组织了高水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使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得以现今面貌奉献于世人面前。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体成员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它能给祖国精神文明建设大业增添些光彩,更期待着读者对它的不当和不足之处给予指正。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内容提要

《典籍志》以中国典籍产生、发展、兴旺的历程为经，以典籍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为纬，勾勒了中国典籍的纵横画面和发展轨迹。

全书共分八章。第一、二章阐释了典籍的概念，典籍产生的时代。并透过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对典籍的影响，描述了战国时期典籍的创作情况和初步繁荣。第三章叙述了学术传统和学术演变对典籍创作与发展的影响，分析了各类学术文化典籍的内容特征和编纂方式，揭示各类典籍在学术传递系统中的地位，以及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第四、五章，系统描述了历代典籍载体的演变，典籍的自然形态，即文字、文字载体、载体材料、材料形状等的发展，以及典籍生产方法的变化，特别是典籍装帧艺术的演变。第六至八章描述了历代公家和私人藏书家收集整理典籍的方式方法和成就，记录了中国典籍分类体系和典籍编目传统的发展，叙述了中国公家、私人、书院、寺观四大典籍收藏系统的演化过程，以及典籍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政治劫难、战争劫难、自然劫难，将典籍聚散及编目整理的画卷呈现了出来。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典籍与典籍的产生	7
第一节 典籍的概念	7
一、典籍的构成	8
二、典籍的本质	11
第二节 典籍的产生	13
一、早期典籍的产生	14
二、正式典籍的产生	17
第二章 百家争鸣与典籍初兴	21
第一节 学在官府与学在四夷	21
第二节 士阶层的形成与百家争鸣	24
第三节 战国时期的典籍初兴	30
第三章 学术文化发展与典籍迭兴	34
第一节 独尊儒术与经学典籍	35
一、经学的确立与经学典籍的发展	35

二、经学典籍的主体——“十三经”	39
三、经学的解经典籍	46
第二节 佛教传播与佛教典籍	51
一、佛教的传入与佛典的流行	52
二、中土撰述的佛教史籍	59
三、汉文《大藏经》的编纂刊行	64
第三节 道教方术与道教典籍	70
一、道教的流传及其典籍的累积	70
二、《道藏经》等道教丛书的编纂	77
三、道教典籍的分类和内容	80
第四节 史学传统与史学典籍	84
一、以时为纲：编年体史籍首开风气	87
二、以人为纲：纪传体史籍的“正史”地位	91
三、以事为纲：纪事本末体史籍兼采二体之长	98
四、各具功能：其他体裁的史学典籍	102
第五节 文学传统与文学典籍	105
一、诗歌的创作及其典籍	106
二、散文的创作及其典籍	111
三、戏剧的创作及其典籍	114
四、小说的创作及其典籍	118
五、诗文评论及其典籍	123
六、文学典籍中的诗文总集与别集	125
第六节 兵法传统与兵家典籍	127
一、古代兵法的形成与兵书的产生	128
二、古代兵法的发展与兵书的完善	132
三、古代兵法的创新与兵书的繁荣	137
第七节 科学传统与科技典籍	142

一、古代科技的产生与科技典籍的出现	142
二、古代科技发展期的科技典籍	145
三、古代科技延伸期的科技典籍	150
四、西学东渐与科技典籍的变化	154
第八节 小学传统与文字、音韵、训诂典籍	159
一、小学创立时期的传统语言学典籍	160
二、小学发展时期的传统语言学典籍	165
三、小学鼎盛时期的传统语言学典籍	171
第九节 类书传统与类书典籍	176
一、类书典籍的起源	176
二、类书典籍的发展	178
三、类书的种类和利用	187
第十节 丛书传统与丛书典籍	190
一、丛书的起源及其种类	191
二、丛书典籍的发展	194
 第四章 典籍的生产材料与生产方法	207
第一节 典籍的生产材料	207
一、纸书出现前的典籍生产材料	207
二、纸书的出现和流行	217
第二节 典籍的生产方法	222
一、印制书籍出现前的典籍生产方法	223
二、印制典籍的出现与发展	226
三、活字排版印制典籍的出现与发展	230
四、套版印制典籍的出现与发展	243
 第五章 典籍的装帧艺术	249

第一节 典籍的版面设计·····	249
第二节 中国古代典籍的插图版画·····	254
第三节 中国古代典籍的装帧形制·····	264
一、简策·····	264
二、帛书卷子装·····	266
三、纸书卷轴装·····	267
四、经折装·····	270
五、梵夹装·····	272
六、旋风装·····	275
七、蝴蝶装·····	278
八、包背装·····	279
九、线装·····	281
十、毛装·····	283
第六章 历代典籍的收藏·····	286
第一节 历代典籍的公家收藏·····	286
一、典籍公家收藏的起源·····	286
二、历代公藏典籍的收集·····	289
三、历代公家藏书处所及管理机构·····	298
四、公藏典籍的利用·····	317
第二节 典籍的书院和寺观收藏·····	322
一、典籍的书院收藏·····	322
二、典籍的寺观收藏·····	330
第三节 典籍的私家收藏·····	337
一、典籍私家收藏的起源·····	337
二、私人收藏典籍的原因·····	338
三、历代著名的典籍收藏家·····	344

第七章 历代典籍的整理、编目和分类	367
第一节 历代典籍的整理	367
第二节 历代典籍的目录编制	397
第三节 典籍分类的发展与演变	425
 第八章 典籍的流散	 443
第一节 典籍的政治劫难	443
第二节 典籍的战争劫难	455
第三节 典籍的自然灾难	465
 参考文献	 471

导 言

“典籍”一词最早盖出于《孟子》。《孟子·告子下》曰：“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赵岐注曰：“谓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可见那时典籍的概念还泛指文献，未必指书册典籍。《尚书伪孔序》则谓：“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后汉书·崔寔传》谓：“少沈静，好典籍。”可见汉朝人关于典籍的概念便是泛指典册书籍、载籍。所以这里的《典籍志》，实则也可以称为《书籍志》或《载籍志》。

中国典籍起于何时，实难详考。《尚书伪孔序》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其意是说早在伏羲时就已懂得以文字记事，以代结绳之政了。伪孔还进一步论列“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意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其意盖欲说明早在三皇五帝时，中国就已产生了《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类的典籍。但这毕竟是传说，谁也没有见过，难以置信。伪孔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故又说：“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

芟夷烦乱，剪裁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原来是传说中的《坟》、《典》、《索》、《丘》等书，经孔子删繁就简、弘扬罢黜而失传了。这些话虽也难以置信，但孔子确实整理了古籍而成六艺，用以课授生徒。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以前，中国确实产生了典籍。但这些典籍乃长期蓄积而成，内容重复，文辞烦浮，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且未成体系。孔子则以教育家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欲广泛行教，宣传古道，“举其弘纲，撮其机要”，因而不得不整理那些已有的典籍以成新籍——《易》、《书》、《诗》、《礼》、《乐》、《春秋》。如果真是这样，则中国典籍的起源似可这样概括：生于孔子前，成于孔子后；兴于孔子前，盛于孔子后。

进入战国以后，奴隶制社会急剧向封建制社会转化。奴隶制的堤岸已被冲决，但还没有全线崩溃；新型的封建制社会已经萌生，但还极不成熟，尚未定型。如何维护旧的堡垒，使之苟延残喘，或东山再起，这是奴隶主阶层及其代言人终日思考和要解决的课题；如何培育新型封建社会这棵幼苗，如何塑造这个社会的形象，则是新兴地主阶层及其代言人终日思考和要解决的课题。两军对垒，各自都想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于是在思想界便形成了一种非常活跃的局面：各抒己见，各申主张，各扬观点，各献治国之策。这就是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伴随“百家争鸣”而来的，是产生了大批的私人著作，使我国的典籍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典籍生产的高潮。早期的儒家、道家、墨家，战国中叶以后儒家又有孟子、荀子；道家又有尹文子、慎子、庄子；新生的法家商鞅、吴起、申不害、韩非子；名家公孙龙、惠施；阴阳家邹衍等等，他们都有自己的著作。与此同时，科技方面也出现了医书《内经》、药物书《本草》，文学方面则出现了不朽的名著——屈原《离骚》。此外在天文、历法、农业、畜牧、历史、地理等方面也出现了专著。

此后虽有秦始皇焚书坑儒、三武灭佛、元人毁道、清廷禁书,以及兵燹回禄之灾,典籍曾屡遭厄运,但自两汉以来,中经盛唐、两宋,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特别是在纸张广泛应用、印刷术通行以后,中国典籍旧有新传,代有新作,多如丘山,浩如烟海,将中华民族的睿智思维物化了出来,凝结成为灿烂的华夏文化。

真正的典籍,是学术发展的结果。换言之,学术发展的结果和表现,是产生大批的典籍。中国的学术起源较早,并且一脉相承,赓续不断。先秦就已萌生的史学、文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农桑种植以及儒、墨、道、法、名等诸子学,在后世的两千多年中,不但赓续发展,有的还不断拓宽和深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以降,则经学独占学坛两千年,直至宋明理学、清代汉学,愈发展愈辉煌。史学自司马迁创纪传体《史记》以降,则中国正史始终沿着此路发展。虽然此前有编年体、此后有记事本末体等大量史书问世,但终未列为正史。自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土,佛学渐染,非但大量佛典被传译,中土著述亦不断丰富佛藏。道教自东汉崛起,渐与先秦道家相结合,成为中土自生自长的宗教。其教义学术,亦千年不衰,递相发展。至于文学,无论诗歌文赋、词曲小令、戏剧小说,都各自有过辉煌的历史。我们必须放眼这些学术发展的大背景,并努力到这种学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探索典籍的源流派脉,才能理清典籍发生、发展的轨迹。

典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它既具备物质形态,同时又具备意识形态。凡是典籍,无论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还是科学技术,都是人们某种意识的反映。而人们的意识,任何时候都要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影响;受时代的局限;受阶级、阶层及个人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的制约;受社会风尚、地域习俗的浸染。所有这些,反映到人们的头脑里,折射到典籍中,就使典籍带上了时代特色、阶级特色、地域特色和个人特色,因而也就使典籍具备了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这